

香港未婚懷孕年青女性與伴侶協商避孕的經驗：一項探索性研究

陶兆銘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朱峰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服務發展主任

宋韋良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助理

摘要

本研究藉著了解香港年輕女性如何與伴侶協商避孕的親身經驗，探討兩性的權力關係如何塑造年輕女性對於避孕的觀感和決定。透過與十位曾經未婚懷孕的香港年青女性進行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社會規範以及年青女性對伴侶所抱有的強烈情感聯繫，是導致她們較難說服伴侶使用避孕套來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兩個重要因素。研究結果有助前線工作者更深入了解兩性關係的權力結構和動態，亦在介入實踐及研究工作上提供重要的資料。

關鍵字詞：年青女性、避孕、性行為、權力、性別

前言

本研究採用了性別與權力的角度，去分析香港未婚懷孕年青女性與伴侶協商進行安全性行為的主觀經驗。而本研究選擇以協商使用避孕套作為討論重點，是因為使用男性避孕套仍是現時在青少年之間最普遍的避孕方法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6; Pulerwitz, Amaro, DeJong, & Gortmaker, 2002; Teitelman, Ratcliffe, Morales-Aleman, & Sullivan, 2008;

Tschann, Adler, Millstein, Gurvey, & Ellen, 2002)。

現時有關年青女性進行不安全性行為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著重分析她們進行不安全性行為的原因，包括未夠了解不安全性行為的危險、不好意思開口要求伴侶避孕、害怕減少在性慾上的滿足，以及對採用安全措施感覺不方便 (Arai, 2003; Ho & Wong, 2006; Thorsén, Aneblom, & Gemzell-Danielsson, 2006; Wingood & DiClemente, 2000)；第二是著重分析避孕的好處和代價，相關研究發現當青少年預計到使用避孕套的好處大於其代價時，便會產生警惕，使用避孕套的機會亦會增加 (Gebhardt, Kuyper, & Greunsvan, 2003; Parsons, Halkitis, Bimbi, & Borkowski, 2000)；第三是著重分析年青人如何說服伴侶使用避孕套，當中以社會學習理論的框架，探討進行安全性行為是受三種社會學習成果所影響：包括(1)避免潛在風險的意向、(2)認為避孕套能有效預防風險的信念，以及(3)認識如何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方法 (Amaro, 1995)。然而，傳統的研究取向存在著一定限制。首先，它們皆缺乏考慮年青女性自身對於安全性行為所抱有的看法及經驗 (Gebhardt et al., 2003; Pettifor, Measham, Rees, & Padian, 2004)。其次，它們較側重於以個人為出發點，未有顧及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如何妨礙女性與伴侶協商進行安全性行為 (Pulerwitz, Gortmaker, & DeJong, 2000; Pulerwitz et al., 2002)。再者，它們也較側重於理性層面的因素，認為只要介入策略能讓年青人認識到不安全性行為的嚴重後果，再給予他們適當的資訊和指導，就會有助年青人作出理性而正確的選擇。但事實上，性行為的發生往往是為了滿足一個人的「心理－社會」需要 (psychosocial needs)。基於渴望得到親密和聯繫感覺的緣故，年青人對於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堅持往往會減低 (de la Cuesta, 2001; Pistole, 1999)。另一方面，近年有研究發現，說服伴侶使用避孕套的意向，也會受到文化因素所影響 (Teitelman et al., 2008; To & Chu, 2009)。以中國文化為例，人們認為與不同的人相處時就要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例如與丈夫相處時就要擔當妻子的角色，而中國「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不主張過份放大妻子的個人權利和關注 (Bond, 1991; Cheung, 1996; So & Cheung, 2005)，否則有機會傷害她與丈夫之間的關係。這種文化觀念有助解釋為何女性於避孕的問題上經常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角色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1995)。

有些學者結合性別與權力的觀點，分析女性對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態度、觀感與行動。

他們認為，權力一方面涉及到微觀層面，即女性的權力如何影響她們說服伴侶使用避孕套；另一方面涉及到宏觀層面，即社會如何塑造兩性的權力結構以及性別角色 (Amaro, 1995; Blanc, 2001; Bowleg, Belgrave, & Reisen, 2000; Jewkes, Vundule, Maforah, & Jordaan, 2001; Pettifer et al., 2004; Tschann et al., 2002; Varga, 2003)。有關微觀層面的討論，有研究探索女性在與伴侶協商使用避孕套時所擁有的權力程度 (Blanc, 2001; Varga, 2003)，結果發現在三種情況下她們行使權力的程度會較低，並會妥協讓伴侶不使用避孕套，包括首次與伴侶發生性行為、伴侶較她們年長，或是隨意發生的性關係 (Gebhardt et al., 2003; Pettifer et al., 2004)。至於宏觀層面的討論則提醒我們，若要真正了解女性的權力，就必須一併考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因素，如何影響和塑造不同的人所擁有的權力。相關研究指出人口特徵例如教育程度、工作地位、社會地位和種族都會影響男性及女性於性關係上的議價能力 (Amaro, 1995; Arai, 2003; Bowleg et al., 2000)。事實上，微觀與宏觀因素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正正構成了性關係中的權力結構。

雖然如此，利用傳統的性別與權力觀點去分析女性如何與伴侶協商進行安全性行為，其實仍有不足之處。學者 Lukes (1974) 指出權力有兩種形態，其一是表現於由甲方向乙方施加的壓迫；其二是表現於透過一些法規去約束某人參與討論的過程。這兩種權力都是顯性的權力，當中包含了人們可以分辨出不同形式的權力結構，而現存文獻主要以顯性權力的角度去分析性關係中的權力結構。此外，Lukes (1974) 提出了第三種權力形態，稱為「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亦即某些訊息在社會上不知不覺地向大眾傳播，從而令大眾自動跟隨並承傳某些傳統的思想、觀感和行為，這就是一種隱性的權力。關於這種隱性權力，我們也有需要參考 Foucault 提出有關權力帶有建構性(constitutive power)的論點。他指出權力與主體(subject)是緊扣在一起的 (Foucault, 1982)。權力可以使主體建構出自己的身份(identity)，以監管與規範自己的行為。Foucault 提出了權力的三個面向 (Foucault, 1990)：首先，權力與論述(discourse)是緊扣在一起的，並構成所謂的「真理」；其次，這些「真理」透過文化和社會制度來行使權力以管治人民，使人民成為權力關係中的客體(object)；最後，個人的身份其實也是權力與論述建構出來的一個主體。根據這套學說，女性在性關係上的議價能力比男性低，其實是源於「男尊女卑」的論述透過文化與社會制度長久以來塑造男女的性別權力位置，同時也使女性自己認定自己從屬於男性的身份，以及

當中所產生的情感依附 (de la Cuesta, 2001; Tschann et al., 2002; Wingood & DiClemente, 2000)。

概念架構

本研究運用「性別與權力」理論發展出一套概念架構，從而檢視蘊藏於年青伴侶協商進行安全性行為的過程中的權力關係。「性別與權力」理論(theory of gender and power)是由Connell (1987) 所提出，此理論為探索性別身份和性行為如何受到「社會—心理」和文化因素所建構而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 (Pulerwitz et al., 2000; Wingood & DiClemente, 2000)。Connell 指出男女之間的性別關係有三種主要的結構，包括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r)、權力分配(division of power)，以及「情感專注」(structure of cathexis)。在勞動分工方面，男與女被社會規範了在學校、家庭和勞動市場裡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在權力分配方面，男性獲得了資格或特權去壓制或影響女性；在「情感專注」方面，女性對於情感親密和聯繫的追求，使她們投放更多情感於浪漫關係裡面 (Tschann et al., 2002)，這樣便會使女性於性交時更願意無私地順從男性 (Jewkes et al., 2001)。從這三個互相重疊卻又有分別的結構，我們可看到社會不但塑造了女性的性觀念，也引導著女性於性關係上如何做決定。透過綜合了「性別與權力」理論（以檢視兩性權力不均等的結構性因素）和社會交易理論（以檢視性伴侶之間的權力交易），Pulerwitz、Gortmaker 及 DeJong (2000) 探索男女在性權力方面的不均等，如何表露於性關係當中，繼而影響女性與伴侶協商進行安全性行為的能力 (Pulerwitz et al., 2002)。這觀點涉及到一個人可以運用多少權力去影響他的伴侶，同時也涉及到一個人投放了多少情感於一段關係之中。雖然過往有不同的學者嘗試了解性別權力與女性能否進行安全性行為之間的關係 (Pulerwitz et al., 2000; Pulerwitz et al., 2002; Teitelman et al., 2008)，但對於這類研究在華人社會的應用性卻仍有待探索。由於篇幅所限，本文聚焦於「性別與權力」理論裡有關權力分配及情感專注這兩個層面的討論。

研究方法

研究背景和受訪者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自 1981 年開始，每隔五年就會進行一項區域性問卷調查。於 2006 年的報告中，13.2%擁有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受訪者及 8.2%擁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女性受訪者曾有過性行為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06)。此結果對比起 2001 年的調查上升了 3%至 5%。當中約有 60%男性及 55%女性有採取避孕措施，而其中有 38%男性及 35.4%女性選擇使用避孕套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06)。

本研究的樣本包括十位年齡介乎 15 至 19 歲的年青女性。她們大部份已完成初中教育。當中八位是地區外展服務的使用者，另外兩位是研究員於迪斯可(disco)中招募回來的。在資料搜集期間，所有受訪者都至少有一次意外懷孕的經驗。其中五位曾懷孕兩次，有一位曾懷孕三次。在各受訪者最近一次懷孕的經驗裡，八位選擇墮胎，兩位選擇誕下嬰兒。本研究以滾雪球式抽樣方法(snowball sampling)索取樣本，因為無論在本地或外地，未婚懷孕少女都是較難接觸的一群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1995)。

圖一：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個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年齡	15	16	19	19	16	19	19	19	17	17
最近一次懷孕的年齡	15	16	17	18	16	19	18	18	17	17
結果	墮胎	墮胎	墮胎	生下孩子	墮胎	墮胎	生下孩子	墮胎	墮胎	墮胎

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用深入訪談方法收集資料，以描繪出一幅較全面的圖畫，以展示年輕女性與伴侶協商避孕的親身經歷。所有訪談皆在私人地方進行，每個訪談歷時約 60 至 90 分鐘。研究員透過傾談形式，帶領受訪者回顧自己的經驗、感受和想法。當中有部份問題會跟隨

訪談指引發問，亦有部份問題是研究員因應參與者當時的回應而即時追問的，以保持訪談過程的彈性 (Rubin & Rubin, 1995)。訪談問題主要關於：(1) 她們對個人的性需要和其伴侶的性需要的看法；(2) 她們對性行為的想法和感覺；(3) 她們對避孕所抱的態度；(4) 她們與伴侶協商避孕的經驗；及 (5) 她們對性關係當中男女角色的觀感。

資料分析

研究員將研究錄音轉換成文字謄本，之後重複閱讀謄本以尋找當中有意義的單元 (meaningful units) 並進行編碼 (Padgett, 1998)。經過整理編碼及互相討論印證，研究員嘗試找出受訪者敘述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及所呈現的不同層次的意義 (Coffey & Atkinson, 1996)。最後，研究員篩選出最能表達這些主題及意義的敘述以展現她們的心路歷程。這樣的設計能從受訪者而非研究員的角度思考這個課題，並補足相關量化研究的不足之處。為加強資料分析的可信性，研究員會反覆查對所有具意義的單元和主題。當研究員之間對某部份資料的詮釋有所差異時，他們會不斷交換意見直至達成共識。

研究發現

經整理十位曾進行不安全性行為而意外懷孕的少女的深度訪談資料，此部份集中檢視在各參與者的故事中出現的主題。雖然各參與者的故事都是獨一無二的，但當中卻存在著一些重覆出現而附有意義的訊息。這些主題可以反映伴侶協商避孕時出現的權力關係，以及少女如何受性別權力關係的影響，建構出個人對性關係的觀感和行為。

協商避孕過程中的權力不平等

幾乎所有參與者都有提及關於協商避孕時所出現的權力問題。以下 June、Betty 和 Grace (本研究所有受訪者均以假名稱呼) 的敘述正好反映權力不平等如何影響少女在進行安全性行為時的議價能力。

這方面我是沒有話事權的。這樣看的話就不太平等了…他不肯戴避孕套，這樣算是不平等了吧！(June)

他邀請我到他的家看影碟。當我到達他的家後，他開始親我，並想跟我發生性行為。我推開了他，他就繼續挑逗我。其實我是忍受不到那種痛楚的，痛得令我哭了。然後他很快便完事。(Betty)

訪問員：你有沒有在進行性行為時做預防措施？

Grace：有時。

訪問員：你會用什麼方法？

Grace：避孕套。

訪問員：有幾常用？

Grace：多數我們也不會用。我們要時他才會買，但如果我不催促他買他就不會買。

以上敘述顯示男性擁有權力去影響女性進行不安全的性行為。這些敘述不但反映了男性權力對女性的直接影響，更揭示出女性沒有權做決定。伴侶之間沒有就避孕事宜作認真的討論。更甚，當某些參與者嘗試拒絕進行不安全的性行為，或要求伴侶使用避孕套時，對方不理會，或者只是在很罕有的情況下願意使用避孕套。

年青女性反抗伴侶的決定權

表面看來，很多敘述都反映出參與者的無力感，但當細閱她們的經驗，就會發現有些受訪者其實是有能力與伴侶抗衡的。以下敘述是她們的經驗：

我不覺得可以在進行性行為時說停就停，但我可以在開始前決定要否進行。我亦不覺得有某一方是處於較高的位置，而另一方是處於較低的位置。如果我不想做的話我就不會做，但我不會利用此來操縱我的伴侶。(June)

如果我真的想作主，我就不會讓他作主，他一碰我我就會立即打他。如果他真的愛我，當我說不時他就應該停止。事實上，如果我不想而他強迫我，我可以告他強姦。(Cindy)

當他沒有用避孕套時我會催促他用。如果他不用，我會叫他走開。(Helen)

在與伴侶協商使用避孕套的過程中，年青女性雖然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但亦不能就此認為她們的拒絕可以改變兩性權力的結構。事實上，如果只是純粹依靠權力與抵抗的概念去描繪伴侶之間在使用避孕套與否的問題上的角力，是很容易以偏概全。這種描繪尤其會忽略了性關係當中的情感因素。

以進行不安全的性行為來滿足伴侶的需要

年輕女性渴望與伴侶維持一種既浪漫又親密的情感聯繫，這種渴望有助我們了解她們與伴侶協商避孕時所遇到的掙扎。在數位參與者的眼中，滿足伴侶的性慾是一種方法或工具去保留伴侶對自己的愛，更可以避免伴侶結識其他異性。她們認為，男性會以伴侶是否願意與其性交來衡量伴侶對他的愛。故此，她們害怕拒絕男友後會影響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以下敘述展示出她們的觀念和經驗：

男生跟我們不同。男生有愛之前必先要有性，他們很現實的。(Mary)

我沒有性慾，但我知道他的性慾很大…我這樣做是為了防止他與其他女生有性行為。(Betty)

我們昨天吵架，他說我不肯去吸引他。我叫他：「走開！」但其實如果他真的走了，我一定會哭。(Cindy)

如果我說不，他就會憤怒起來，然後說：「好，你根本不愛我」或者「你根本不緊張我。」(Grace)

由此可見，雖然年輕女性的確有抗衡權力關係的意向，但這個意向未必有助於改變兩性的權力結構。受訪者希望與伴侶維繫一段良好的關係，因而順從伴侶的想法和要求。亦因為害怕伴侶與她們分開，故避免拒絕伴侶或與伴侶爭論。這些想法和行為正正妨礙著年輕女性對於安全性行為的堅持。

年青女性對情感聯繫的渴求

除為了滿足個人和伴侶的性需要之外，年輕女性與伴侶有浪漫的行徑，包括性交，其實也是一種途徑去獲得更深層次的親密感和聯繫。大部份受訪者認為性交可以讓雙方感受到彼此間的親密、熱情和著迷。以下是她們的想法：

（透過性行為）我會知道到底我跟他有沒有交流，有沒有合得來的感覺。我會知道到底我有沒有對他產生厭倦…以前我很容易就會與男生搭上，只要他們想跟我發生性行為我都會願意。(June)

如果你說性是先於愛，我雖然不會反對，但至少你也要喜歡那個人你才會可以有性…性可以增強兩人之間的親密感。(Ivy)

我不知道，但（一段關係裡）有性是必需的，是不可能沒有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性是這樣特別…我感覺如果雙方彼此相愛，我們就會有性。(Eva)

Helen：他說他如果不戴避孕套的話會感覺更加刺激，我就說如果他不戴我就不做了，然後他說：「那好吧。」

訪問員：你有否試過在男朋友沒有戴避孕套的情況下與他進行性行為？

Helen：有時候。

訪問員：為什麼？

Helen：有時候是因為他不開心、有時候是因為感覺好像好一點。

以上敘述展示出，男女之間的權力不均等並不是令不安全性行為發生的唯一因素，另一因素是女性對於從伴侶身上獲得親密情感聯繫的渴求。當其中一方想使用避孕套而另一方不想時，我們可以預料到有較大情感需要的一方會作出讓步。對於她們來說，維護情感的聯繫比起保障自己的安全來得更重要，這種犧牲在她們眼中甚至是愛的憑證。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受訪者表示雙方也沒有絕對的權力強迫對方，有些更憶述曾因男朋友不願意使用避孕套而跟他鬧翻。然而，其實每個受訪者都嘗試過進行不安全的性行為，最後導致懷孕。在這件事情上，權力不應純粹被理解為甲方向乙方施加的壓制。權力也有助建構年青女性的性身份，從而塑造她們的想法、感覺、行為和互動。換句話說，權力有著不同的形態，有顯性亦有隱性，具衝突性亦具建構性。這些都可從訪談敘述中反映出來，更讓我們進一步理解權力結構與當中的動態關係。

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與過往相關的量性和質性研究結果一致 (Pulerwitz et al., 2000; Pulerwitz et al., 2002; Teitelman et al., 2008)，同樣發現於性關係中擁有較大權力的年青人，可以左右避孕套之使用，而年青男性普遍比女性擁有較大的權力 (Blanc 2001; Jewkes et al., 2001; Pettifor et al. 2004; Teitelman et al. 2008; Tschann et al. 2002; Varga, 2003)。此外，在使用避孕套與否的問題上，避孕與否的決定權是建基於性關係的權力結構 (Bowleg et al., 2000; Teitelman et al., 2008; Tschann et al., 2002)。

最近的研究指出，若然不仔細分析權力結構當中的複雜關係，是不能真正了解協商使用避孕套的決定過程。然而，這些研究比較著重於權力的顯性層面以及權力具壓制力的特性。他們集中檢視一方如何行使其權力主導做決定的過程，使另一方順從，甚至控制另一方的行為 (Bowleg et al., 2000; Pulerwitz et al., 2000; Teitelman et al., 2008, Tschann et al., 2002)。

本研究發現，年輕性伴侶的想法、行為和互動可能受著一種隱性的權力所影響 (Connell, 1987; Wingood & DiClemente, 2000)。這種隱性權力，或所謂的「虛假意識」，在社會上一直不知不覺地控制著年輕女性的想法和行為，並鼓勵她們遵從這種意識形態 (Lukes, 1974)。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是被期望要以滿足伴侶的需要為先，滿足個人需要為後。如果她們與伴侶抗衡，她們就會被視為非典型女性。而年輕女性在社教化底下漸漸也內化了這些有關性別的訊息，導致她們在說服伴侶使用避孕套時，成為了被動和順從的一方。那就是說，權力塑造了她們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她們如何看待自己與性伴侶的關係 (Foucault, 1982, 1990)。本研究亦回應了「性別與權力」理論，指出年輕女性的性行為是受著一種對親密情感關係的渴求所支配 (Connell, 1987; Teitelman et al., 2008; Wingood & DiClemente, 2000)。年輕女性對於自己的存在感，以及自己作為女性的身份認同感，都是建基於一段浪漫關係之上。她們認為犧牲對自己的保障，與伴侶進行不安全的性行為，是維繫與男朋友的關係的一個合適方法。這種想法同樣是社會現存性別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之下的產物。

參與者的敘述也支持「人在關係」(self-in-relation) 的女性發展理論。根據 Gilligan (1982) 和 Miller (1986)，女性十分積極於維繫和深化與自己認為重要的人的關係，而女性的自我、個人特質，以及道德判斷都是建基於這份積極的維繫之上。年輕女性尤其會投放更多心力去建立或維繫與伴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避免與伴侶有衝突 (Amaro, 1995; de la Cuesta, 2001; Pistole, 1999)。這樣的話，年輕女性很容易就會墮入兩難局面—究竟應該為滿足伴侶而放棄避孕，還是保障自身安全而堅持避孕呢？Gilligan (1982) 和 Miller (1986) 認為，年輕女性應該不斷學習和嘗試平衡自身的利益與伴侶的利益。透過這種方法，她們才可以發展出一種成熟的愛，既保存了自我，也變得成熟。

就文化層面來說，文化為集體生活提供了一套富有規範性的指引。在中國文化裡，人不是一個個體，而是關係的一方，因此人的身份在他處身的社會網絡裡被定義 (To & Chu, 2009)。性別角色也是被中國文化裡的傳統信念和價值所建構。在儒家傳統裡，男尊女卑，以至男女的行為舉止也有分別 (Bond, 1991; Cheung, 1996; So & Cheung, 2005)。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女性應該持守「女性」的美德，例如同理心和體貼；而男性則應該表現出「男性」的特徵，例如掌控和進取 (Bond, 1991; Cheung, 1996; So & Cheung, 2005)。研究結果顯

示女性於使用避孕套的協議上較為被動，是與上述文化觀念互相呼應的。雖然如此，訪談資料同時也展示出有些受訪者縱然珍惜與伴侶之間的親密聯繫，但也會嘗試抗衡伴侶的主導。要解釋她們這種行為，就需要考慮到受訪者的背景。她們都是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合璧的地方土生土長，雖然有受中國文化所影響，但作為香港市民她們又十分關注個人權利。事實上，雖然中國傳統與西方傳統對於個人與關係持有不同的看法，但研究指出這種分別正不斷縮小 (Han, 2002; Marshall, 2008; Tang & Dion, 1999)。但是，這並不代表少女的性行為和避孕態度就此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To & Chu, 2009)。

對實踐與研究的含意

性關係當中的權力動態是十分複雜的，在安全性行為的問題上，並不能純粹以充權理論 (empowerment theory) 來提倡女性的自主性就可以改變兩性的權力關係。一方面，充權理論往往被誤解，因為前線工作者傾向把充權理論應用到微觀的介入實踐，例如加深年輕女性對不安全性行為負面後果的認識，以及教育她們向伴侶說「不」 (Blanc, 2001; Jewkes et al., 2009)。另一方面，有些介入手法主張提升年輕女性對權力與支配的關注，甚至動員她們參與改變兩性關係的社會運動 (Villaverde, 2008)。然而，假若前線工作者未能真正了解她們的內心掙扎，以及協助她們在自身經驗中建構新的意義，則前線工作者較難協助她們建立富有反思的身份 (reflexive identity)，從而結合反思與行動去面對文化和社會的權力結構 (Brabeck & Brown, 1997; Worell & Remer, 2003)。前線工作者並非要質疑她們的順從和被動恰當與否，而是要協助她們說出更多內心的想法，並在敘述過程當中使自己更明白自己的掙扎。同時，前線工作者也要喚醒她們的勇氣和能力去表達自己的意願和運用自己的權利。例如，前線工作者可以協助她們表達自己對性關係的看法，利用問題逐步引領她們認真地反思。總括而言，有關性別的充權介入應該是以人為本、著重前線工作者與當事人的協作，以及明白與豐富當事人在性別關係中所賦予的意義 (Brown, 2008)。

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在協議使用避孕套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介入策略不應該只是協助女當事人，還要使她們的性伴侶參與其中。相關的活動和輔導服務應該包括：協助雙方認清各自對愛情關係的期望和各自的性觀念、協助雙方達成避孕的共

識，以及協助雙方發展正向的性別角色並認清性別的不平等。此外，在評估女當事人的背景時，必須同時了解其所處身的文化 (Brown, 1995; To & Chu, 2009)。以香港為例，前線工作者有必要發展一套中西文化混合，甚至多種文化混合的介入策略。與此同時也要協助她們抗衡「男尊女卑」的中國文化，敢於保障自己 (Worell & Remer, 2003)。

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本文嘗試描繪年輕女性與伴侶協商使用避孕套的經驗，反映出她們在性別權力結構當中處於不利的位置，並需要我們的關注和支持。有見及此，日後有需要進行更多質性研究以發掘更多關於她們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並且需要探索年輕男性對性關係和避孕的看法。此外，研究可以採用論述分析的方法 (methodology of discourse analysis)，這種研究方法有助挑戰主流論述，擴大弱勢的聲音，提升年輕女性對性別議題的關注，並鼓勵她們參與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運動。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有關香港年輕女性與伴侶協商使用避孕套的探索性研究。滾雪球式的抽樣方法以及較少的樣本影響了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此外，受訪者都是教育程度較低的一群，因此本研究未能知道擁有不同的教育程度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年輕女性會否有不同的經驗。因此，將來的研究如果能夠探索屬於不同群組的年輕女性的心路歷程，必定能夠豐富我們對此研究題目的認識。

參考資料

- Amaro, H. (1995). Love, sex, and pow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6), 437-447.
- Arai, L. (2003). Low expectations, sexu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Explaining teenage pregnancy and fertility in English communities: Insight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199-217.
- Blanc, A.K. (2001). The effect of power in sexual relationships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2(3), 189-213.

- Bond, M.H. (1991). *Beyond the Chinese face: Insights from psyc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leg, L., Belgrave, F.Z., & Reisen, C.A. (2000). Gender roles, power strategies, and precautionary sexual self-efficacy: Implications for Black and Latina women's HIV/AIDS protective behaviors. *Sex Roles, 42*(7/8), 613-635.
- Brabeck, M., & Brown, L. (1997). Feminist theory and psychological practice. In J. Worell & N.G. Johnson (Eds.), *Shaping the future of feminist psycholog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15-3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rown, L.S. (1995). Cultural diversit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 Landrine (Ed.), *Bringing cultural diversity to feminist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143-16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rown, L. S. (2008). Feminist therapy as a meaning-making practice: Where there is no power, where is the meaning? In K.J. Schneider (Ed.), *Existential-integrative psychotherapy: Guideposts to the core of practice* (pp. 130-140).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Cheung, F.M. (1996). Gender role development. In S. Lau (Ed.), *Growing up the Chinese way: Chinese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45-6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offey, A., & Atkinson, P. (1996).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Complementary research strategies*. Thousand Oaks: Sage.
- Connell, R.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la Cuesta, C. (2001). Taking love seriously: The context of adolescent pregnancy in Colombia.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Nursing, 12*(3), 180-192.
- Foucault, M. (1982). Subject and Power. In H. Dreyfus & P. Rabinow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p. 208-22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ebhardt, W.A., Kuyper, L., & Greunsven, G. (2003). Need for intimacy in relationships and motives for sex as determinants of adolescent condom us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3*(3), 154-164.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Z.L. (2002). Culture, gender and self-close-other(s) connectedness in Canadian and Chinese sampl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2, 93-104.
- Ho, B.C.O., & Wong, D.S.W. (2006). Sexual health and unwanted pregnancy among adolescents: Implications for sex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H.S. Holgate, R. Evans, & F.K.O., Yuen (Eds.), *Teenage pregnancy and parenthood: Global perspectives, issues and interventions* (pp. 95-111).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1995). *Teenage pregnancy: Service and policy options*. Hong Kong: Author.
- Jewkes, R., Morrell, R., & Christofides, N. (2009). Empowering teenagers to prevent pregnancy: Lessons from South Afric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1(7), 675-688.
- Jewkes, R., Vundule, C., Maforah, F., & Jordaan, E. (2001). Relationship dynamics and teenage pregnancy in South Afric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2, 733-744.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 Marshall, T.C. (2008).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timacy: The influences of gender-role ideology a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5(1), 143-168.
- Miller, J.B. (1986).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2n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 Padgett, D. (2008). *Qualitative method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Parsons, J.T., Halkitis, P.N., Bimbi, D., & Borkowski, T. (2000). Perceptions of the benefits and costs associated with condom use and unprotected sex among late adolescent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 377-391.
- Pettifor, A.E., Measham, D.M., Rees, H.V., & Padian, N.S. (2004). Sexual power and HIV risk, South Africa.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0(11), 1996-2004.
- Pistole, M.C. (1999). Preventing teenage pregnancy: Contributions from attachment theory.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1(2), 93-112.
- Pulerwitz, J., Amaro, H., DeJong, W., & Gortmaker, S.L. (2002). Relationship power, condom use and HIV risk among women in the USA. *AIDS Care*, 14(6), 789-800.
- Pulerwitz, J., Gortmaker, S.L., & DeJong, W. (2000). Measuring sexual relationship in HIV/STD research. *Sex Roles*, 42(7/8), 637-660.
- Rubin, H.J., & Rubin, I.S. (1995).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hearing data*. Thousand

Oaks: Sage.

- So, H.W., & Cheung, F.M. (2005). Review of Chinese sex attitudes and applicability of sex therapy for Chinese couples with sexual dysfunction.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2*(2), 93-101.
- Tang, T.N., & Dion, K.L. (1999). Gender and acculturation in relation to traditionalism: Perceptions of self and parent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Sex Roles, 41*(1/2), 17-29.
- Teitelman, A.M., Ratcliffe, S.J., Morales-Aleman, M.M., & Sullivan, C.M. (2008). Sexual relationship powe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condom use among minority urban girl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3*(12), 1694-1712.
-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06). *Report on the Youth Sexuality Study 2001*. Retrieved January 20, 2007 from <http://www.famplan.org.hk/fpahk/zh/template1.asp?style=template1-asp&content=info/publications/yss01.asp>.
- Thorsén, C., Aneblom, G., & Gemzell-Danielsson, K. (2006). Perceptions of contraception, non-protection and induced abortion among a sample of urban Sweish teenage girls: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raception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11*(4), 302-309.
- To, S.M., & Chu, F. (2009). An 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young Chinese females in the course of unintended pregnan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Medicine & Health, 21*(4), 531-543.
- Tschann, J.M., Adler, N.E., Millstein, S.G., Gurvey, J.E., & Ellen, J.M. (2002). Relation power between sexual partners and condom use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1*(1), 17-25.
- Varga, C.A. (2003). How gender roles influenc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mong South African adolescent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4*(3), 160-172.
- Villaverade, L.E. (2008). *Feminist theories and education: Primer*. New York: Peter Lang.
- Wingood, G.M., & DiClemente, R.J. (2000).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Gender and Power to examine HIV-related exposures, risk factors,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for women.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27*(5), 539-565.
- Worell, J., & Remer, P. (2003).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therapy: Empowering diverse women* (2nd ed.).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